

甘肃省改革开放成就展望——基于多元、微观视野下家庭个体行为研究

万瓌媛

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DOI:10.32629/er.v3i3.2586

[摘要] 改革开放37年以来,甘肃省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带给普通民众的实惠和利益显而易见。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多元、微观视角,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出发,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给家庭个体的变化展开研究。

[关键词] 人口迁移; 投资决策; 民主政治; 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政治、科技、文教、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都取得重大进展,整个社会处于良性循环。本文基于多元、微观视角,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层面,就改革开放给家庭、个体带来的变化展开研究。

1 人口的迁移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人是“理性”的,资源是稀缺的,面对贫瘠的土地,恶劣的气候,不畅的交通,严重不足的水电设施,传统落后的耕作方式,甘肃的贫困家庭,一小部分有劳动能力(体力和劳力)和远见卓识的农民开始冲破传统封闭、落后、保守的自然经济小农意识枷锁,解放思想,走出乡村,进入城市。人口的迁移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也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她是整个社会综合国力提高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1.1 人口迁移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变了个体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资本投入的目的是保值和增值,劳动创造价值,在耗费一定量的体力和脑力之后,人们必将取得相应等量的报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更会得到认可和补偿,外出经商、打工或租种闲置土地都将带来对等的收入,并以利润、工资和产品形式呈现。相比传统落后的耕作工具、耕作方式和耕作条件,经商和打工在付出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后,得到的劳动报酬可能更多,甚至成为很多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主要的生活来源。

家庭收入的增加最直接可见的效果就是积累了家庭财富,人口迁移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多子女进城务工家庭。有了可供支配的货币他们就有了相对充足消费资格;经济条件是衡量阶层地位的重要尺度,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社会地位、名望和话语权的提高,进而享受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权利准入机会,这在任何一个社区和村落都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水平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投资决策、婚育观念、教育理念、家庭结构和氛围,人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修养和情操受到强烈冲击,原有传统封闭、落后、保守、专制观念,被现代民主、文明、和谐、理性思想所替代,人们的精神家园重建,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关注未来和长远。

1.2 人口迁移利于两地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商品经济背景下,生产必然和分配、交换、消费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迁入地还是迁出地,人们都要消费。

在迁出地,随着收入的增加,大量资金必然要在市场上流通,尤其是在人口占绝大多数中国的农村市场。也就是说农民会在集贸市场购买生产工具

和生活用品,进行消费,这必然刺激农产品和日用品的生产和加工,繁荣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发展。

在迁入地,大量迁入的“农民工”从事建筑、环卫、食品、服装、餐饮、流通等服务业,这不但合理配置了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资源,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也作出了直接贡献。而迁入地的扩大的购买力同样刺激了商品生产,活跃了市场经济。

1.3 人口迁移利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不同地域、民族、地缘和血缘的人拥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语言服饰、建筑格局、行为方式、精神信仰……人口的迁移利于生产方式和生活经验的交流,多元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迁徙人口带去原始传统农耕文明和宗族社会结构下纯朴自然的民风,优秀的“乡土文化”,独特的饮食品味、民族风情、习惯风俗、礼仪规范;而回到迁入地的人员也带入城市优秀、精英文化,现代生活方式,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还有一小部分人通过经商、打工、就业和通婚,积累了优势组织、经济、人力、社会等资本,取得当地“居民”资格或“市民”身份,逐步融入当地生活,成为随迁人口中的“精英”阶层。……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流传、发展和创新,整个中华民族也在多元文化交流和不同民族融合中前行。

1.4 人口迁移促进城市公共管理体制改革

人口的迁移也带来了交通拥挤堵塞,租房困难、看病难、择校困难、教育准入限制,这无疑对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的改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逐步探索中进行的。面对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措手不及的大小突发事件,各级各类政府机关必须具备应急能力,适应变化,艰辛努力探索如何更好发展经济、文教、社区管理的道路,进行食品安全、住房、金融、交通、医疗、社保、教育、就业及其他政治体制的改革,对社会惠及民生各项事业进行规范、合法、有序管制。

1.5 人口迁移带来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在就业市场,尤其是会计、医生、教师及餐饮等行业,女性的工作能力和男性相当,甚至更强,而国家就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雇主对女性的歧视减少;甚至在很多领域,如保健、餐饮等服务业更倾向于雇佣女性。而现代新型农具的使用,交通和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政府计划生育及其他就业、教育、住房、补贴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诱导优惠,使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彻底改变。

2 家庭消费水平、投资结构及决策的变化

2.1 家庭财富的增加带来消费结构、水平和层次的变化

即从不消费(积累)到部分消费,从低档消费到高档消费,由物质消费

向精神消费，由物力资本投资向人力资本得转化。

2.2 家庭决策及投资的变化

2.2.1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1) 体制的转变。即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多种经营方式的转变。如家庭联产承包向租赁制、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等形式过渡。

(2) 农产品品种的变化。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改革中农民看到麦、藜、菽、粟等传统单一粮食作物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市场需要，也更加注重蔬菜、水果、花卉、药材、制种等经济作物的栽种，乳肉蛋禽等高营养食品的生产与供给。

(3) 产业结构升级，农业布局合理调整。市场的选择，政府的干预，科技的引入，思想的更新……有形无形的力量自觉不自觉地带来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布局合理调整。狭义种植业向农、林、牧、副、渔广义农业过渡，传统农业向职业化、专业话、专门话、特色化而后科技化等现代农业过渡。

2.2.2 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是成功的阶梯，在教育、医疗保健方面的投入没有白费的。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人们普遍认识到人力资本的生产配置能力与长效积极作用、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体。——教育直接投资减少，间接投资增加；教育层次提高，年限增加，类型多样，职业教育受到青睐；义务教育向更高质量发展；学前教育遍及全社会；医疗卫生及保健投入增加。

3 民主社会、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逐步构建

20世纪中后期，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新公共管理”理论背景下进行不同层级的改革。甘肃省省委省政府在与世界接轨、国际影响和国家改革的前提下，顺应时代潮流，服从现实需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锐意进取，积极探索政府改革。在管理思想上，实现了从“官”本位向“民”本位，从计划指令——指导——服务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人治——法治——德治转变，从“单一管制”向多元管理转化，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回归。在管理机制上，实现了政府行政权力收缩，机构裁汰，有效防止政出多门；精简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能力，强化“廉政”和“为民服务”态度等职能转变。在工作内容上，民主法制社会的积极构建，适时政策法规的增减，制度冗余和匮乏限制的冲破为公民享有与维护更多民主政治权利、合理表达民意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可能条件；对各项公共事业的的投资和管理，为公民创造了更好安定生活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从理念到操作再到效果，从内容到实质再到形式，甘肃省和政治改革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成就。

3.1 政治民主化步伐加快，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加，思想觉悟提高

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主政治的健全完善，法律的“除陈布新”，民生的关注惠及，为公民各种政治权利的享有和运用提供了物质保障、制度保障、空间和机会，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政策的公开、透明与公正，理想和谐“公民社会”的构建提供现实土壤与依据。

首先，公民的权利意识强化。法治社会权力制约下，公民理性合法重

塑、享有和自觉维护自由、平等、安全、公平、公正、民主等“公权”的意识越来越强，如听证会、信访制度的实施；对自然灾害、法律修订、企事业单位改制、社会福利等重大政治事件、突发事件和切合自身利益的事件关注度越来越高，如对朱镕基总理当年国企改革的排斥到逐渐理解与维护。其次，除了传统意义上基本民主权利（公权）之外，公民的私权也在经济社会发向纵深发展中得到尊重和重视。2004年，人们的申诉权、话语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新闻自由权等人权也提上日程。

再次，中华民族古典精粹文化强化，公民道德情操回归升华。改革开放的背后，其实是生产资料、各种资源、思想观念、基本价值取向、心理状态、行为方式、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打破和重构，是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所以，在开放初期学习先进体制文化，引进先进技术经验过程中，出现资本主义享乐、重利、“拜金主义”、自我中心等腐朽不良文化传播是正常的；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进步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爱国爱乡爱家方式、拓展了“臣民”社会、“家文化”观念也是合理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和政府的倡导，中华民族“国家主义”、“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核和精粹实质随着改革的反而更强；新一代国民环保、规则、自我保护等思想觉悟更高，勤俭节约、尊老爱幼、“慎独”等道德情操攀升，特别是少年儿童。

3.2 公民实际权利的增加

民主政治不仅是形式口号、思想意识中的，更重要的是在实际行使中体现的。甘肃政府在完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人代会等基层民主制度后，普通民众的实际普选权增加；在实行居委会、村委会机制后村民能够自主自愿选择代表自己利益，真正为“群众服务”，说实话、办实事的代言人；费改税、阳光工程、反腐倡廉、等政务公开透明后，普通人能够旁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价格监管等惠及民生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能够通过书信、电话及公共邮箱对政府及工作人员行为进行建议及检举，能够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对权力寻租、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公款吃喝、财产不明、渎职、不作为等腐败现象予以曝光、监督和检举；在建立和谐政府和信访制度后，弱势群体可以对房屋拆迁、子女就学、老年人残疾人社保、贫困救济等侵犯个人权利或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法律申诉和行政救助。新时代下，甘肃公民已经历从绝对服从政府到作为群体主体的存在，再到作为个体主体存在的转变，其法律意义上的参政权、议政权、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申诉权、平等权……得到有效释放和实质行使，“以人为本”、和谐、良性互动的新型“国民”关系初见端倪。

[参考文献]

- [1]刘伟平.14年政府工作报告[N].甘肃日报,2014-1-20.
- [2]张岳红.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合理性及其控制[J].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5.
- [3]郝双才.培育现代社会阶层:调控基础教育社会阶层失衡的核心所在[J].基础教育参考,2005(4):34-37.

作者简介:

万璠媛(1984—),女,汉族,甘肃定西人,讲师,管理学硕士,单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